阎真文集第五卷

阎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历史要求决定文化选择
——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命运之逆转 …… 1
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 12
追求百年文学总结的经典性 …… 27
人类的寓言与民族的寓言
——中西荒诞文学价值取向评析 …… 38
想象催生的神话
——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 …… 49
文化史的虚构
——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七大缺失 …… 61
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差异 …… 74
在现实生活与虚构世界之间
——略谈中国现代小说的介入意识 …… 85
推进爱国主义与民主化建设的良性互动 …… 97

鲁迅的意义:文化大转型的标志 …… 104
鲁迅:不同历史现场的价值错位 …… 111
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荒原
——论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 127
理解阿Q:在现实主义界柱之外 …… 134
理解阿Q:从新的基点出发 …… 145

经典性:对当代作家的历史挑战 …… 154
长篇小说在世纪之交的使命 …… 165
超越观念
——第一阶段改革题材小说的艺术缺陷 …… 172
迷宫里到底有什么
——残雪后期小说析疑 …… 179
网络小说艺术取向反思 …… 189
网络文学价值论省思 …… 194
渴望澄清之水 …… 199
崇拜经典　艺术本位 …… 204
一部好书,可做教材 …… 209
汉语是我们的文化身份证 …… 213

这是我的宿命 …… 215
追寻我们生命的意义空间
——《曾在天涯》写作随感 …… 217
放弃绿卡 …… 225
豆芽故事 …… 227
为当代知识分子写心
——《沧浪之水》写作随想 …… 229
屈原的意义 …… 233
精神的重量 …… 235
遥想李白当年 …… 237
无人见证的牺牲 …… 239
关于《因为女人》答北大校友 …… 241
还原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生态
——阎真长篇小说创作的访谈 …… 245

历史要求决定文化选择

——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命运之逆转

内容提要 一百年来，中国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历史性逆转，即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全面摧毁到今天的全面复兴。这种摧毁和复兴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选择同时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取决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历史要求。历史要求决定文化选择。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基本历史要求是反思国家危亡的文化根因，而今天的基本历史要求是寻求大国崛起的文化自尊自信。对今日中国而言，传统文化是大国崛起进程中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源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是中国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记，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然历史要求，并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

从陈独秀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启动，迄今已近百年。

一百年来，中国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百年前的被全面摧毁，到今天的全面复兴。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历史性反差是如此鲜明，如此巨大，我们用“惊天逆转”来描述这一文化事件，是毫不夸张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历史性逆转？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必然的和合理的，其历史依据和内在逻辑又是什么？难道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的文化姿态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或者，今日的全面复兴是一种历史性倒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关

涉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更关涉一个民族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命运。

一

对于前述问题，我的看法非常明确，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否定，以及今日的全面肯定，都是必然的和合理的。

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既定存在，两种极端对抗的文化选择为什么会同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呢？

在这个文化事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常量，它存在着，没有任何变化；文化选择则是个变量，我们看到，历史的选择是截然相反的。导致这种截然相反选择发生的，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以及由这种条件和背景所决定的历史要求。

什么是历史要求？历史要求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体性存在，也不是宿命式的神秘力量，而是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这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民族，都是具有绝对意义的利益要求，也是人们判断一种社会制度、价值姿态和文化选择是否合理的终极标准。因此，一种价值姿态和文化选择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这种姿态和选择是否正确，并没有绝对性，而需要从变化了的历史要求出发做出具体分析。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学说，一切制度和文化选择，都有其历史具体性，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有其正确性，即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这些学说或选择都没有绝对性，否则，其意义和价值就可能，甚至一定会走向反面。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这就要求人们的理论思维不能僵化凝固，而要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要求。如果人们教条地坚守某种理论，哪怕是经典理论，以"凡是"的态度将其绝对化、神圣化，就不会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不会有市场经济，不会有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马列经典毛泽东思想如此，对任何理论、观念、价值选择和文化姿态都是如此。

因此，任何理论、理念、价值选择和文化姿态都没有绝对意义，有绝对意义的是历史要求。正确的方式是前者调整自己的存在状态来适应后者，而绝不是相反。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历史性逆转，我们才能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选择同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悖论状态给出合理解释。

二

以最决绝的姿态全面反叛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代表传统文化正宗的儒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代杰出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人，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而决绝的批判，“打倒孔家店”成为纲领性文化口号，不留任何余地成为历史性文化姿态。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他的文化姿态，代表了历史的潮流和历史的选择：

>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①

> 对于此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

鲁迅的表态稍慢半拍，算是“听将令”应声而起。但由于他的文学地位，他是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人：

>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的两个字是“吃人”！③

>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④

用“吃人”“人肉的筵宴”来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将其一棍子打死，没有任何折中、妥协的余地，这是鲁迅的姿态，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姿态。鲁迅类似的表达非常多，比较典型的表述还有将“国粹”比喻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等等

---

①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

②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

③④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5、216页。

等等。

更有甚者，是钱玄同废弃汉文的观点：

> 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①

> 二千年来汉字书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②

从上述所引的几段话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当时的思想潮流。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知道孔子“仁者爱人”和孟子“民为贵”的思想，读过《离骚》《史记》，读过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和《红楼梦》，也是一辈子用汉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如此决绝的表态？既然如此决绝，为什么他们还会对传统文化潜心研究（如鲁迅后来还用文言文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学术经典）？

从纯粹的学术立场来看，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态都是偏激的，站不住脚的，也是经不起追问的。不加区别地打倒国粹和旧文学，欲置孔孟、老庄、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朱熹、王阳明、曹雪芹于何地？中国的文明真的是人肉的筵宴吗？汉文真的要废弃社会才能进步吗？这种种表达，我们今天看来是近于疯狂，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甚至难以理解的。当代也几乎没有学者用这样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难道，这些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丧失了理性，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或者，我们今日的文化选择是一个历史性倒退？

对这一问题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历史要求决定文化的选择。文化选择的正确与否，宏观上应该从历史要求而不是学术立场予以判断。

按马克思的说法，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理论思维，也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只有置入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予以观察，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屡遭挫败。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应对之策，不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中体西用”等纲领性口号，都跳不出中国文化本位的框架。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观念现代化如此艰难，也表现了传统文化内在的情感魅力，难以割舍。经过几十年的迟疑，中国知识分子痛切反思

---

①② 钱玄同《寄陈独秀·中国今日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卷4号。

国运衰微的文化根因，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应对历史的大变局，要救亡图存，思想现代性已是一个紧迫的历史使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矛盾是如此尖锐，无可调和。现代性追求是一场思想革命，一场精神地震，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动因。“打倒孔家店”和白话文运动，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发动革命，以断裂的姿态抛弃传统，都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更深刻的心理动因，还是为了救亡图存。过去几十年屡战屡败的痛苦经验证明，跳不出传统文化情感和思维的窠臼，没有思想观念向现代性的革命性跨越，不以“民主”“科学”为时代旗帜，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这种特殊的历史格局：救亡图存爱国主义必须全方位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

在这个文化大转型的时刻，偏激或者说“片面的深刻”成为了一种顺应历史要求的选择，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传统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对人们的精神制约是如此深刻，没有矫枉过正的态度，就不能完成思想现代性的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可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由于历史的使命是如此紧迫，学术性的平和作为一种文化姿态，注定被紧迫的历史要求淘汰。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偏激的文化姿态，虽然在学术意义上不合理，但在历史要求的意义上却完全是合理的。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要求，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要求。只有跳出学术的纯粹性，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历史要求作为一种生存诉求，是要大大高于学术诉求的。今天某些学者从学术纯粹性出发，批评当年彻底反传统的文化姿态，是迂腐之见。民主、科学和人道观念的迅速普及，白话文在几年之内成为正宗，都体现出这种偏激的文化姿态巨大的社会成果。陈独秀、鲁迅等人并非失去了学者的理性，而是为了完成一场思想革命，尽快地收到实际的效果，不得不选择矫枉过正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但不能对新文化运动横加指责，而且要为之做出强烈的辩护。

三

在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获得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以至普通百姓的群体性认同和亲近，在国家的文化战略中也成为了积极的和极为重要的构成因素。这种对传统文化上下一致全民一致的亲近和认同，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形成了异常强烈的对比。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名誉的冲动早已有之。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左翼文学内部以胡风为代表的否定派与向林冰为代表的肯定派，冲突非常激烈，这场讨论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形式的肯定划上句号。这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空间。又如路翎在四十年代出版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主人公蒋少祖，他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攻击传统文化，但最终还是将儒家文化作为了自己最后的精神归宿："他们为什么连月亮都是外国好，给孔子涂上那样的鬼脸？——爱好孔子，因为他是中国旷古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可以激发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不是说就要接受礼教！"[①]这样一种反对把孔子妖魔化的认识，当时被胡风批评为"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②]可是我们看到，小说中人物在四十年代的看法，与六十多年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看法，是十分吻合的，而"可以激发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真正说到了问题的最核心之处。

以后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谈不上兴盛，但除了"文革"时期外，传习、研究基本能够正常进行，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局面，渐渐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为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恢复名誉的最初冲动，来自二十多年前的"寻根文学"。这是一个有相当完整理论支撑的文学思潮，其代表作家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文化姿态进行了反思，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系统性地将反思的锋芒指向新文化运动。韩少功认为，中国文学应当发挥东方文化的审美和思维优势，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阿城认为，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应从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中孕育出来。他的这种表达也许夸大的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意识源流的意义，但提出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应包蕴民族传统的总体构想，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的姿态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更有人对新文化运动予以激烈批评，认为其全盘反传统的姿态造成了中国文化源流的断裂。这种种观念，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术、理论，到文学创作，再到社会普及的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孟程朱老庄等等，不但恢复了学术的荣誉，甚至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等著作，对传统文化表示了学术意义上的肯定，影响极大。"国学热"从

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06 页。

②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至今长盛不衰。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在文学创作上，《白鹿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曾国藩》《品中国文人》等，作为代表性作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崛起营造了声势。更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十年如一日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为传统文化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品三国》销量以百万计。不但在知识界，在民间，国家力量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扩大影响的重要推手。清明、端午和中秋这些中国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日，以至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清华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高校基本职能之一，今年“七一”讲话，更是提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可以看出，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已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文化战略。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这种惊天逆转，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历史要求。时代变化了，历史要求变化了，这在宏观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历史性逆转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历史要求，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大国崛起的姿态使中国人的自尊感和自信心有了极大的增强。这种自尊感和自信心不但要在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上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化软实力上得到强烈表现。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内蕴丰厚，是当今中国人表达文化自尊自信，表达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是其一切现代意义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它的一切功能都无从实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居然提出“仁者爱人”，孟子则提出“民为贵”，这种思想的前瞻性与现代的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简直可以直接对接，天衣无缝，令人惊讶，令人感动，令人崇仰。还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还有青铜器、山水画、书法……那种万丈光芒，使最自信的现代人都要低下自己高傲的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力量，艺术的力量，魅力无穷。细想一百年前，居然有人提出废弃汉字，那种文化姿态虽然可以在“片面的深刻”的思路下得到语境性理解，但在感情上还是令人血脉扩张，拍案而起！汉字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证，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废弃汉字，就是文化自宫，文化自裁！在文化自宫自裁的后面，就是一个民族生存空间的自宫自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依托传统文化，以文化的自信追求民族软实力的提升。这种追求的后面，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强烈愿望和生存发展的强烈追求。

第二，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身份认定意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冲突，制约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已经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格局大体处于一个放弃民族性，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如果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基于自身魅力的生命力特别强韧，中国文化基因将在西方文化的包围和蚕食之中所剩无几。民族性和现代性，这是一种价值悖论，既是理性的悖论，也是情感的悖论。这种悖论让中国知识分子痛苦焦虑，无所适从。现代性是我们绝对需要的，没有现代性就没有历史的进步。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性否定，正是基于现代性诉求而选择的文化姿态。但同时，民族性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没有民族性，我们将失去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基点。我们是中国人，不仅是人种意义血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丧失了文化的民族性，我们是谁？切断了传统，我们又到哪里去找寻民族性？如果有一天，我们虽然还是人种意义上的中国人，却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那不是太恐怖了吗？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前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也不能接受的。如果真有那一天，现代性的意义还剩几何？文化身份问题，绝对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失去了文化身份就失去了民族的自我，变成文化上的“他者”。多年前在法国参观卢浮宫，所有说明全是法文，连英文也没有，叫人看得一头雾水。当时觉得法国人太保守了，没有中文说明，有英文也可以啊！法国人就是这样以文化保守主义来维护自己文化的主体性的。在全球化进程中，怎样保持文化上的自我身份和主体地位，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明确表态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读中国的书，尊重“国粹”，而不能把中国的文明视为“人肉的筵宴”。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自身的血肉，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之所以说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人的血缘、人种、情感体验和审美要求融为一体的。无论如何，圣诞节都取代不了春节，柏拉图取代不了孔子，拜伦、海涅取代不了李白、杜甫，荷马史诗也取代不了《红楼梦》。

第三，比身份认定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在生存层面的意义，而生存的意义，是高于一切的。中国是十几亿人组成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靠文化的力量凝聚起来的，而传统文化，就是这种力量的根基。有统一的文化根基才有统一的情感和价值认同。这个文化的根基，也是我们生存的根基。没有这个统一的文化根基，十几亿人就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把局部的利益诉求文化诉求放到最高的层次来作为价值取向，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必然是天下大乱，分崩离析，独立的旗帜处处飘扬。哪还谈得上什么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有了这个统一的文化根基，才能在心理上建构血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水的价值认同，才能把所有的局部诉求统一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这一最高层次的神圣诉求之中。试想，如果没有犹太教，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几千年，早就被同化了，哪里还会有今天的犹太民族和国家？这就是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生死攸关的意义。我因此认为，割断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文化上的自宫自裁，更是生存意义上的自宫自裁。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会深刻认识到炎帝黄帝、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有多么重要，多么伟大。由于科技的发达，地球变小了，人们还有普适性价值作为交流沟通的基础，“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这是真实的。可更真实的，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军备竞赛的世界上，这同时也是一个国力竞争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野如此清晰。浪漫主义的吟唱能够解决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吗？这是多么残酷而冷峻的现实，这才是更深层次的生存的真相。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看清这个大格局，看清什么才是十几亿中国人生存发展的根本，并站在这个情感和利益的基点上说话，而绝不能抱着一厢情愿的幻觉面对世界。普适性价值不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人也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成为世界公民，而只能作为中国人存在。当别国领导人把本国利益挂在嘴边，并当作基本政策导向和绝对原则时，我们能够高唱“心连心”，基于普适性原则做一个世界主义者吗？一切世界主义者的理念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都将破产，除非他不把十三亿中国人的生存当一回事。基于这种最基本的现实，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坚守自己的民族性，其实别无选择。这是对自我身份，自我尊严和自我生存空间的坚守，放弃坚守就将失去这一切。这是多么严肃而严峻，沉重而沉痛的话题！在今天，当我们处于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对“软实力”的需求是何等的迫切。可是，“软实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离开了文化母体，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软实力”？因此，从宏观的历史格局来看，肯定传统文化，这根本就不是传统文化本身对错优劣的理论问题（正如犹太教对犹太民族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核心利益问题，生存空间问题，这既是文化多样性和身份认定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今日中国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这是历史要求，也是事情的本质。

四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提出“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但历史发展证明这一理论没有普适性意义。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思

想解放运动的纲领性口号之一，它打破了平均主义，以核动力的能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当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两极分化，这个口号就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于是我们看到，一种价值表达，其合理性、有效性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够成立。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存在形态。

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在今天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即已经不能满足今日中国的历史要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否定来否定今天的肯定，或者用今天的肯定来否定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否定，都是非历史主义的。

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欣慰地看到了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既现代性和民族性可能兼容，使我们不必在价值选择上执此一端，用现代性反对民族性，或者用民族性反对现代性。陈独秀当年说，孔教与新社会不相容，这一判断已经过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是可以分解的，也就是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可能的，这使我们可以在坚持民主、科学、人权、人道观念，抛弃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家族制度的同时，从孔孟直到曹雪芹那里汲取太多的精神和情感养料。民主、科学、人道等普适价值，既不能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野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特别是中国人面临的所有价值和意义问题。在这种普适价值的视域之外，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民族自信自尊问题、心灵和精神问题，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面对的力量，寻求情感的归宿。当然，民族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压抑现代性的理由，反之亦然。这样，我们既是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又是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现代的立场和民族的立场都是绝对必需的。没有民族的立场，他将失去和十三亿中国人站在一起的利益和情感的支点；没有现代的立场，他将失去理性方向，成为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这两种状态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将是致命的缺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还必须正视现代性和民族性可能产生的冲突，特别是要看到民族性中的负面因素对现代性可能的阻扼，并保持必要的警惕。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取决于民族心理认同，而不取决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台湾跟大陆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弘扬却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民族的必然选择，而不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进程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意义渺茫观念是错误的。这种观念低估了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情感上的血脉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精神家园的意义。同时，认为传统文化在市场的挤压下无所作为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市场经济的确向传统文化发出了挑战，比如，孔子要讲君子小人的义利之

辩，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原则，但市场却要讲利，并且不分君子小人，只讲强者弱者。还有契约观念对伦理观念的解构，还有群体本位和个人本位、修身养性与利欲冲动，千秋情怀和现世快乐的冲突，等等。挑战是严峻的，同时，传统文化回应挑战的能力也是极为坚韧的，这种坚韧是它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独自屹立不倒的力量所在。历史要求决定文化选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今日中国而言，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是一种历史要求，利益诉求，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要求。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大国崛起进程中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源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是中国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记，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弘扬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然历史要求，并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

（2011 年 12 月 12 日）

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内容提要 本文描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全面反叛以及在世纪末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认同这一历史演变轨迹，多方面地论述了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复杂而深刻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对一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

一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统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作为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流脉，儒家文化历久不衰，其生命力之强韧，在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它不但是一种官方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每一个细部。儒家文化的这种地位，使它对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稳定、秩序、等级和结构。这既是其正面意义所在，也是其负面影响所在。认为儒家文化仅仅满足了统治者的利益和需要，是片面的，秩序和结构是百姓也需要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皇帝的个人需要，而是别无选择的社会结构性需要。儒家文化作为与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也是别无选择的社会结构性需要。儒家文化为社会规定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却也使社会在这种稳定中压抑个体，扼杀一切有创意的事物，失去了更新的活力。儒家文化与皇权政治和小农经济三者互为因果、互为支撑，形成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从儒学取得统治地位的汉代到鸦片战争前，这种结构变化甚微。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这是与历来改朝换代不

同的“五千年一大变局”。中华民族在蒙受屈辱的刺激下，却也获得了一种打破铁板结构，进行文化更新的可能性。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在这种挑战面前，其回应是极其迟缓而被动的，这种迟缓被动充分表现了儒家文化僵化保守的文化个性。儒家文化在理论上的严谨性，感性上的亲和性和精神上的神圣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如此社会巨变面前，仍不能也不敢对其进行本体性质疑。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才有康梁等人冲破“中体西用”的精神桎梏，呼吁以西方社会伦理观念为中国文明的主体。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中断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对儒家文化进行根本性挑战的历史条件并没成熟。这种潜伏在历史必然性中的挑战姗姗来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越是蒙受外辱，就越是要强调自身的民族性以御外，而这种民族性在最大的程度上是由儒家文化所规定的。辛亥革命后儒家文化失去政权的支撑，延续数千年的铁三角结构被打破，为历史挑战的到来创造了条件。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皆借重于孔孟，这大大刺激了具有文化革新冲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与儒家文化彻底决裂的理性力量和道德勇气。至此，儒家文化也如中国政治体制一样，面临数千年一大变局了。

但文化形态不是政治结构，不可能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截然切断。儒家文化在二十世纪失去了其政治权威性，但作为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仍有强韧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生活仍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对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一种线索性的描述。

二

与上世纪末的维新派不同，新文化运动表现了价值选择的决绝性，即与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在理智与情感上彻底决裂。这样一种对儒家文化的毫无留恋毫不妥协的攻击姿态，是数千年来不曾出现过的。这是一种巨大的深刻的精神革命和情感革命，具有震动性断裂性的特征。这种震动和断裂，首先表现为语言质料方面的革命，即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一九一五年创办之初就表现出激进的文化姿态，但一开始并没有为文化革新找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突破。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点希望，姿态激烈，目标却比较宽泛，没有明确具体的攻击点，因而对旧

文化展开批判的有效性是不够的。胡适在一九一七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用改良一词,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此文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普遍社会回应性的突破方向。文章所言"八事",主要寻求在语言表达方式方面进行革新。陈独秀极为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话题的突破性意义,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予以响应。至此,白话文运动掀起轩然大波,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数千年"言文分离"的传统,白话文成为文学正宗。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一两年之内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改变,白话文运动来势之凶猛,成效之鲜明,大约是连倡导者也始料不及的。

白话文运动作为一种语言方式的革命,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语言方式的革命,比思想观念的革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想在"言文不一"的语言方式之下进行彻底的思想革命,与儒家学说彻底决裂,那是不可能的,即使获得一时的思想进展,也终究要回到原来的精神窠臼中去。当年的维新派终于走向复古,语言方式没跳出来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就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特定的思想一定要用特定的语言来表现。新的语言方式不但带来大量新的词汇新的观念,同时也解构了儒家文化在言说方式上的权威性。言说方式的权威性一旦丧失,思想上的权威性就失去了依托。中国在过去几千年"言文不一",在语言方式上进展甚微,根本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白话文运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通道,这是这个运动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语言方式的革命一旦展开,就难以逆转,由此而带动的思想革命,也就难以逆转了。白话文运动对儒家文化精神权威性的打击是沉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关于白话文的争论如此激烈,这本质上是革新与守旧、进步与停滞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几乎与白话文运动同步,新文化运动第二个攻击对象也骤然明确,即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全盘否定儒家学说的思潮席卷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摧毁儒家文化的精神统治地位。孔子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偶像,数千年来并非没有经历过思想挑战,但此时第一次被描述为妖魔鬼怪。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从精神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根本。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揭示儒家学说与帝制之间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认为三纲五常违背平等人权观念。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思想清算。在这种历史大潮面前,儒家文化的拥戴者的回击是相当虚弱的。这是一个狂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